

※ 學林誌傳 ※

從張元濟編印書籍中探索其愛國思想

簡承禾*

一、前言

來臺前的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印書館）以出版教科書為主，對於近現代教育改革做出極大貢獻，張元濟先生（1867-1959）是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在他的主持下，教科書除加入新式教育理念，也教育學童愛國精神。到了晚年，張氏主要從事輯印古籍的工作，出版一系列的《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對於保存古書做出莫大的貢獻；他自己曾賦詩說：「我為古人蘄續命，更從新法式留真。多君不惜娜嬛秘，舉世莘莘獲饋貧。」¹可見張氏輯印古籍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了保存前人留下的文化，二是希冀後人能發揚其中的精神；在保存與宣揚之際，更是期待藉由固有的文化與世界接軌，試圖從中找出平衡點，能對國家有所貢獻。

有關張元濟先生的專書、文章相當豐富。大陸分別於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二年舉辦「張元濟研究討論會」，各界發表的文章達近百篇，有針對其教育、出版工作、校勘成就討論，也有從平時活動討論其注重教育及愛國思想²。雖然如此，但多

* 簡承禾，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

¹ 張元濟：〈贈傅沅叔〉，《張元濟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5。

² 有關張元濟先生所遺留下來的資料有：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林慶彰編：《蔡元培張元濟往來書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0年）；張樹年、張人鳳編：《蔡元培張元濟往來書札 附與其他名人往來書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等書籍。有關兩次討論會及會外論文，均見於張元濟圖書館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6年）。至於臺灣方面，有吳柏青：《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蔡崇安：《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臺北：淡江

半不在意其序跋所傳達的思想與精神；究其原因，當代學者多視其為文獻學、出版學的大家。況且張氏不從事經學、史學等傳統學術的研究，主要精神都在比對版本、校勘字句的工作上，所留下的跋文、校勘記是目前從事文獻研究的重要遺產。然而，我們時常在他撰寫的跋文中見到對於時事的感慨，這是整理古籍的過程中，從古人的文筆下反應出現實狀況的心情。

本文試著從張元濟先生主持印書館時所出版書籍的廣告詞及其書後跋文，並輔以日記、詩文等，來探討他編印書籍所蘊涵的愛國思想，分別從教育理念、對古籍的態度、緬懷先人各方面分析；換言之，張氏不管在編印教科書，抑或是校勘、影印古籍之時，對於國家時事及未來發展都有所關心，吾人不應置之不論。

二、張元濟生平概述

張元濟先生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卒於一九五九年；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其所處的時代，正值國家風雨飄搖之際，面對時局的變動，他和當時的有志之士一樣，勵圖變法革新以救中國；但在政治上不得志，遂轉向教育、出版界。茲簡單介紹張氏的生平，以概見時局與編印書籍的交互作用。

(一) 從京官到革職

張元濟先生在廣州出生。十四歲以前，因為父親張森玉(1842-1881)於廣東任官，所以這段期間張氏在粵東從舅父謝榴生學習；十四歲以後，才回到原籍浙西海鹽。十六歲以後，分別受業於一名廩生查濟忠，以及進士朱福詵。

眾所周知，張元濟先生在仕途上平步青雲，二十六歲便已是進士出身，名列翰林院。但清末國勢傾危，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1894)失敗後，張氏開始積極尋求變法圖強之道，他便著手規劃官辦的西學堂。張氏認為單是政治改革不足以救國，而是應從教育著手，以啟民智。

除強調以教育為重外，張元濟先生同時也主張維新變法，但所涉不深，卻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後獲「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排除於官場之外。一八九九年他在盛宣懷(1844-1916)的安排下，任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致力教

大學漢語文化暨資源文獻研究所碩士，2008年)等。

育精通西學的人才，擬出的課程有英文、算學、化學、政治學、理財學等，有別於中國傳統書院或私塾，將南洋公學推上一個新的階段。一九〇二年辭去南洋公學校的職務，應夏瑞芳(1871-1914)之邀，投入商務印書館，成為印書館最早的股東。

(二) 主持商務印書館

印書館原先是一所印刷為主的出版社，張氏加入之後，確立以「扶助教育」為宗旨，開始計劃一系列編譯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教科書、外文辭典等，希望藉此來啟迪民智。

其先，張元濟先生曾擊劃涵芬樓的創建，做為印書館的藏書地；但張氏懷有開民智胸襟，認為涵芬樓藏書不能僅僅用來印書之需，更要對外開放供大眾閱讀。因此，一九二四年一棟五層的新大樓竣工，一九二六年將涵芬樓遷入新址，更名為東方圖書館，並且對外開放。不料，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東方圖書館被日本軍機轟炸，存於三樓的古籍付之一炬。張氏隨即召開董事會議，重振印書館，短短半年就恢復原來的出版能力，並陸續出版《四部叢刊》等一系列的古籍。

一九四八年，張元濟先生膺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當選原因是對於文化貢獻甚鉅。一九四九年因中風而臥病在床，但仍校編《涵芬樓燼餘書錄》，可見其對於文化出版事業的堅持。一九五九年，以九十三歲高齡逝於上海³。

張氏畢生以教育為主旨，出版過教科書，而對後世貢獻最鉅莫過於影印古籍。總計影印的古籍有《四部叢刊初編》、《續編》、《三編》、《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更早之前，也有計畫印《道藏》、《四庫全書》，但由於時局混亂，無法運送大套書籍而作罷。

三、扶助教育

張元濟先生以「扶助教育」做為印書館的宗旨；因此，張氏在輯印古書之前，

³ 介紹張元濟先生生平的相關書籍有：陳建民：《智民之夢——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張榮華：《張元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周武：《張元濟：書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張學繼：《出版巨擘——張元濟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張人鳳編：《張菊生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等專著。

曾選編印近現代教育的教科書。他的教育觀裏，人民讀書識字，未必都要成為社會、國家的棟梁，而是在使人民普遍都有知識水平，即所謂的「民智大開」。民國初年，有識之士投入教育改革中，為傳統接軌到現代。張氏從基礎教育著手，參與規劃、編輯小學教材。在取材方面，強調不必處處學西方，而是以中國的文化為根柢，目的在養成對自己國家的認同。

（一）重視基礎教育

面對西力東漸的壓力，國家致力培養外語人才，希冀能學他人之長，補己之短；雖然張氏深知培養外語的重要性，但對於本國語言、文字仍不可輕易廢棄，反而更要重視，其曰：

勿以洋文為常課；語言文字者，生民之大用，立國之精神也。⁴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根基；他舉當時世界殖民地的例子，來強調學習本國語言文字的重要性，並藉由文字來認識自己的文化。張氏的理念，在光緒三十年（1904）所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更可見其對於本國語言文字的重視，廣告詞曰：

童蒙入學，茫無知識，而我國文字多半艱深，往往有讀書數年，不能寫一信，記一帳者。欲謀教育普及，不可不於國文加之意矣。⁵

認為國文是普及教育最重要的學科，最主要是希望廣土眾民都能識字，能識字至少可以處理日常生活的溝通、應付工作的內容；然而中國文字艱深難學，對於童蒙初受教育而言，在學習上有很大的障礙，導致讀書數年，卻連一封信，甚至記帳都有困難。換言之，張氏認為識字是教育的最基礎層面，所以文字的教授方式應該改進，如此才能普及教育，進而培養國人基本的謀職能力。

民國初年國內興起教育改革，現在所熟知的大學課程，是經蔡元培先生（1868-1940）、胡適先生（1891-1962）等人奔走改革，才有今天的面貌；而基礎教育同樣也經過一番調整，方逐漸定調。一九一七年以前，兒童讀物都還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出現，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教育才普遍被接受⁶。印書館在這

⁴ 張元濟：〈答友人問學堂事書〉，《張元濟詩文》，頁171。

⁵ 張元濟等人編：《東方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影印《東方雜誌》第1期〔1904年1月〕），第1冊，卷1，頁10。

⁶ 吳研因：〈清末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陳應年等編：《1897-1992 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208-209。

段期間，逐步改良文言文的解釋方式，使幼童易於明白；張氏認為教育應是簡易普遍的，並非艱深難懂的，從他的日記可以窺見其教育理念：

昨晚談編輯新教科書事。國文主張先編言文一致者若干。又句法宜順不宜拗。又選字宜先習見者、不拘單體複體，例如先見狗、後見犬。又稍深之字，宜先有解釋之課，然後再見。例如牧童之字，宜先有牧字一課，不能先用牧童。又每隔若干，宜有練習課，用俗譯。又編纂時，每成一課，即譯一句。⁷

討論編輯教科書的事情是出於眾人，然而張元濟先生的理念也在其中。即便不易看到印書館早期出版的教科書，但從這段開會的結果得知，至少國文科已經具備當今臺灣小學國語課本的樣子；先是有單字，集合許多單字後才有造詞，而且「練習課」猶如「國語習作」。唯一最大的差別，張氏討論的文體是淺近文言，與現今所用的語體文不同。

除編印國文課本外，張氏並不偏廢西方的教育內容，從《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來看，總共出版的項目有：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語文學、自然科學、應用技術、藝術、文學、史地等各方面，包羅古今中西的學科⁸。雖然出版各類書籍未必都由張氏經手，但張氏是印書館的靈魂人物，參與其中是可想而知的。

(二) 培養國族認同

編印國文課本，以提高識字率外，更進一步灌輸本國文化，培養學生對於國族的認同。光緒三十三年(1907)出版《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其廣告詞曰：

採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進民德、改良風俗者依次編入，由淺及深，循序漸進。末數冊於合群、愛國尤為再三致意。全書十冊，適供初等小學五年之用。第一冊全用圖畫，不著一字，令兒童不生厭倦。⁹

從廣告詞可以得知：1. 雖然不以傳統的《四書》為教學內容，但仍以古人的「嘉言懿行」來教育學童。2. 施以「合群、愛國」等國族認同，以培養愛國情操。3. 教育方式上，已考慮到幼童的心理層面，於低年級使用的書籍，僅用圖畫表達。綜合來

⁷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上冊，頁161-162，「1917年2月5日」條。

⁸ 見《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891年)，頁128-129。

⁹ 張元濟等人編：《東方雜誌》(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第4年第3期〔1907年3月〕)，第13冊，卷4，不標頁數。

看，在方法上已學習西方教育心理學的理論，不使幼童在學習時有較大的壓力；內容取材上，雖然摒除傳統科舉的文章，但仍以中國傳統為範疇，選其可以為人模範者為施教內容。如此觀察，似乎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味道，但張氏曾說：「然又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謂也。……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種種學術，以與吾國之民質、俗尚、教宗、政體相為調劑。」¹⁰ 換句話說，張元濟先生認為取西方的學術以為中國之用，必須經過挑選，才能合於國情民俗；既不固守，也不全盤革新，而是透過西方的精華來補強自己本身的不足。

國家接二連三的危難，使許多學者投入傳統學術研究，錢穆先生(1895-1990)撰寫《國史大綱》，表彰中國歷史悠悠長遠的原因；陳寅恪先生(1890-1969)研究隋唐五代史，希冀從中找尋中國得以復興的可能。一九三七年，張氏從教育的角度著手，從《左傳》、《戰國策》、《史記》中挑選八篇故事，編寫成《中華民族的人格》，其〈編書的本意〉這麼表示著：

孔聖人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夫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幾句話，都是造成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¹¹

張氏並非史學家，卻也從史書中挑選可為中華民族人格的代表；透過古代烈士的表現，從各角度揭示民族大義，以教育新一代國民，最終還是希望從前人身上學到恢復國家的民族精神。回顧他主持編輯的《最新修身教科書》所說的「採取古人嘉言懿行，足以增進民德、改良風俗者」，相去三十三年，期望國家從紛亂的局面走出，張氏始終沒有放棄，並且繫之於來者。

如果將廣告詞視為編教科書的動機，可以看見張元濟先生認為開啟民智首先要普及教育，而非菁英教育，這與許多人的觀點不同，卻是較治本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教科書中培養國族認同感，非一味崇外與過度地排外，而是適度吸收以合於我國文化。

¹⁰ 張元濟：〈答友人問學堂事書〉，《張元濟詩文》，頁 171。

¹¹ 張元濟：〈編書的本意〉，《中華民族的人格》（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1-3。

四、寄懷於古籍

張元濟先生的校勘學問是後人所景仰的，其愛國精神更是吾人極為推崇的情操，而這樣「願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期望，不僅在平時生活可見，在他的詩文、序跋等也顯露無遺。

當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張氏和許多前清士子一樣，從政治的核心轉為遠離政治的知識分子¹²；於是張氏將心思放在圖書文獻上，「寄懷在圖史，抗志希明哲」¹³，同樣埋首於故紙堆中，別人是從事中國文化的分析，他是整理傳統文獻，將國家復興的希望寄託在圖書之中。以下將討論張氏輯印古籍所表現對於國家的關懷。

（一）考文獻愛舊邦

張元濟先生主持印書館期間，藉由印書館的資金全力搜羅宋、元、明善本，用當時的攝影、印刷技術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如果我們將涵芬樓視為張氏的藏書地，從他畢生輯印古籍可以觀察出，張氏向各地藏書家收購古籍善本不是為了興趣，更不是等待書籍的增值，而是保存文獻，他曾為詩如此表達：

中原文物凋殘甚，欲饋貧糧倍苦辛。願祝化身千萬億，有書分餉讀書人。¹⁴
戰亂的局面，又使書籍再次遭逢厄運¹⁵。張氏擔心國事動盪，將使許多古籍不見人世，於是利用當時的照像、影印出版技術，使珍貴圖書化身成千萬冊；此外出版古籍的底本，並非每部書都是涵芬樓的，而是向各地藏書家、圖書館求借¹⁶。由此更清

¹² 雖然張氏早已無心於政治，遂轉向教育、出版界，但從另一角度觀察，早年曾積極尋求變法，以挽救國家頹危之勢，但民國以後雖心繫國家命運，卻又無可奈何。這樣的情況，在清末民初的讀書人身上隨處可見。余英時先生(1930-)、羅志田先生(1952-)對此都曾提出解釋。分見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33-50。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154-189。

¹³ 張元濟：〈題劉澂如七十小像〉，《張元濟詩文》，頁2。

¹⁴ 張元濟：〈題朱遂翔抱經堂藏書圖〉，同前註，頁82。

¹⁵ 隋代牛弘(545-610)曾舉出自秦至隋以前逢五次災厄，明代胡應麟(1551-1602)也列出隋唐至宋末的五次災難。無論如何，凡是戰亂對書籍而言都是極大的破壞。

¹⁶ 舉《四部叢刊》來說，其底本主要來源有四：1. 上海涵芬樓，2. 南京的江南圖書館所藏丁丙八千卷樓藏書，3. 江蘇常熟瞿啟甲(1873-1940)鐵琴銅劍樓，4. 湖州劉承幹(1882-1963)嘉業樓。除涵

楚知道張氏不是為了興趣藏書，其內心是承繼發揚文化的使命；在〈印行四部叢刊啟〉他明白說道：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知新溫故，二者並重。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¹⁷從啟事可以看出他整理古籍的宗旨，是希望藉由傳統文獻來喚起國人對於自己文化的重視。另一方面，張氏眼見當時內憂外患不斷，於是有「求書之難」的感嘆；書籍承載前人的言行舉止與思惟，如果沒有書籍，中國的學問與精神便無法流傳於後世，「國學之微」在當時鼎革之際，是張元濟先生非常擔憂的。同時也反應出由書籍的聚散，可以看見國家的興衰。

張氏不同於所謂的國學大師，畢生闡揚文化精神，建立一套中國學說系統，他是從最基本的書籍開始著手，留有古書的面貌，才能建立正確的學說系統，保留完善的文化精神。

輯印一系列《四部叢刊》，可說是他畢生出版生涯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也可以窺知張氏輯印古籍「考文獻愛舊邦」的特色。因此以《四部叢刊》為例，劉兆祐先生(1936-)認為有幾點特色，摘錄如下：

- (1) 實用性高——《四部叢刊》所收，經、史、子、集四部裏的任何一種書，都是一般人為了解中國文化及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所最常用的。
 - (2) 保存文獻的原始面貌——《四部叢刊》的每一書，完全照原書影印。
 - (3) 所選用的多為善本——張元濟在選輯《四部叢刊》時，一方面固然重視宋元刊本，但是如有明刊本較宋元本好的，則用明刊本。這說明了張氏不像一般藏書家有「佞宋」的缺點，而能兼顧到學術上「求真」、「實用」的精神。¹⁸
- 茲就劉氏所列，進一步舉例說明：

1. 張元濟先生所輯，除學術上常用的書外，更藉古人著作來傳達文化精神；因此凡是能喚醒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及表彰氣節者，都是實用書籍。如：宋、元之際的王炎午(1252-1324)所撰《吾汶藁》，其內容大致敘述亡國後，表彰忠孝節義；張氏作跋說：「余讀其文，而因之重有感者：古今來殺身成仁之士，其所謂扶植綱

芬樓藏書是商務印書館自身的書外，其他都是向各大藏書家借照。見張學繼：《出版巨擘——張元濟傳》，頁 218-223。

¹⁷ 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跋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下冊，頁 857。

¹⁸ 劉兆祐：〈實用與善本並重的四部叢刊〉，《國文天地》第 2 卷第 3 期（1986 年 8 月），頁 57。

常者，猶是表見之名，而實則深恫。夫社會重心一有移易，回環震蕩，……不忍睹視，故以一死殉之，將以警惕其國人，使知為無上哀痛之事。」¹⁹

2. 張元濟先生為古籍撰寫許多校勘記附於書後，以便讀者了解該書的來龍去脈；並且於書的首頁標明該書的原版尺寸，如：宋本《公是先生七經小傳》板高二十三公分，寬一六公分、宋本《爾雅疏》板高二十一公分，寬十五公分；皆提供從事文獻研究者許多關於版本的線索。

3. 張元濟先生輯印《四部叢刊》雖然重視版本，但並非一味措意於版式的久遠，只要後代版式較前代佳，則會選用年代較晚的版本。仔細觀察，張氏多半挑選卷數、內容完整為首要。如：北宋吳棫的《新唐書糾謬》，張氏不採用嚴重殘卷的影宋本，而是選擇「版刷清美」、卷數較全的明刊本²⁰；足見他在版本與內容權衡之間，較注重書籍的完整性。

王紹曾先生(1910-2007)解釋張氏輯印古書的用意：

一是為搶救民族文化遺產，使其免於淪亡；二是為了解決學者求書之難，滿足閱讀的需要；三是為了匯集善本，彌補清代樸學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²¹

王氏所下的注腳，第一點與第二點可以清楚了解張元濟先生將古籍視為中國文化的遺產，而其中的精神則留待學者去研究、發揮。第三點則接續清代樸學的傳統，並且期望能修補前人未精確的地方。換句話說，張氏提供「考文獻」，而讓學者去「愛舊邦」；當然並不是說張元濟先生只是單純的出版業者，而沒有表彰文化，但很明顯地，對於學術上文化的闡揚，張氏的確讓位給其他學者，自己退居在樸學的領域中。

綜合而言，張氏不僅在形式上的版本下功夫，更希冀透過古人的思想，傳達文化的靈魂；所以在選擇書籍時，不單單是學術上常用的書籍，即使冷僻的著作，只要能激發讀者對中國文化的重視，也在選編之列。因此書籍的完整性更重於版本的價值，唯有保存全書，才能更清楚文化的全貌。

¹⁹ 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下冊，頁 969-970。

²⁰ 張元濟跋曰：「涵芬樓舊藏沈寶硯校影宋本……故上册得五十二葉，下册得五十葉，惜中册佚去。沅叔同年以明刊本眎余，版刷清美，因取以印行。」同前註，頁 933。

²¹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57。

(二) 激於時事

張元濟先生正逢國勢頹危之際，先是清廷無力對付強勢西方，民國肇建後，非但沒有安民立國，卻陷入另一場軍閥的內戰，接繼著是對日抗戰；民不聊生的景象，張氏無一不看在眼中。因此在張氏的校勘記、跋文之中，除敘述該書的來歷、版本的比對之外，也將當時對國家的心情表露於紙上。我們合理推想：張氏在選編古籍之初，必然已先讀過一遍；讀書之時，透過古人的文字，興起他對於時事的感慨。在胡安國(1074-1138)的《春秋胡氏傳》，其跋曰：

胡氏此書，成於南渡之後，激於時事，語多感憤。……胡氏當日無非對證發藥之言。然自今觀之，胡氏之言，又豈僅為南渡後宋之君臣發哉！吾竊願讀是書者，時時毋忘胡氏之苦口也。²²

張氏解讀《胡氏春秋傳》中的褒貶之辭，無疑地也是他對於時事的褒貶之意。跋文舉魯莊公十七年(677 B.C.)，齊國派士兵戍守遂國，最後卻被遂國全部殲滅；意味著遂雖小國，也可以智取擊退強國。又舉魯昭公十一年(531 B.C.)，楚國於四月圍攻蔡國，至十一月才破城，主要原因是蔡全國上下死守不降²³。張氏從《春秋》中體現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有以小勝大，有上下團結一致以禦外侮的史事；讀古代的戰事，反觀當時政府無力率領全民對抗日本侵華，而是自己打自己的內戰，卻放任外患長驅直入，張氏眼見國事之荒謬，因有此感。

一九三六年正是國共戰爭最極端的時期，張元濟先生於《天下郡國利病書》撰跋曰：

亭林身嬰亡國之痛，所言萬端，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過數事：曰兵防，曰賦役，曰水利而已。敵國外患，奸宄竊發，以守其國，不可無防。防之於外，則門戶洞開，不可無以遏之；防之於內，則伏莽遍地，不可無以靖之；欲盡其道，責在於兵。有兵不可以無養，養之之責，又在於民。……有國者既不能不增此數十百萬之民，用之於安內攘外之途，自更不能不重取吾民數百千萬之財，以贍此不稼不穡之輩；曰吾將以禦外侮也，吾將以戡內亂也，而民又何辭。然果有未雨綢繆之計，先足食而後足兵，則生事稍裕，供億雖

²² 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下冊，頁886。

²³ 同前註，頁886。

繁，抑猶不至於顛躓。²⁴

張氏藉由顧炎武(1613-1682)對於亡國的反省，提出身為一國之主應該力在養民，而後才足以養兵，最終用軍隊來抵禦外侮。深受中國傳統教育影響的張元濟，此時表現出來的就是孔子所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的觀念。張氏這篇跋文的時間，是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占優勢的時候，然而觀察戰爭所帶給百姓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經濟崩潰²⁵；易言之，政府對外不能抗敵，對內又不能照顧民生，所以張氏認為養民是主政者最大的責任，唯有養活百姓，才能使國家強盛。因此後面又接著說：「蒞民之事，得其道則利，失其道則病；利則其民奮而國隨之以興，病則其民悴而國隨之以亡。」²⁶雖然都是老生常談的訓語，卻也發生應驗。

對於國家內戰不能禦外侮，張元濟微言大義點出；而追昔撫今的心情，張氏在《大清一統志》的跋文表現相當沉慟，其曰：

方戰事至烈之際，飛灰漫天，殘紙墮地，無一非吾商務印書館之書，而是書獨告無恙。……雖然，展卷以觀，我國家全盛之時，如朝鮮、如琉球、如暹羅、如越南、如緬甸，何一非朝貢於我者，今猶有存焉者乎？如蒙古、如西藏、如新疆，今猶能屏翰吾圉乎？引領北望，舉數百萬方里之沃壤，任人割割，莫敢誰何！租賃之地，遍於口岸，深入腹地；外人艦隊，出入無禁；設營置戍，悉惟其便。嗚呼！僅僅九十年而日闕日蹙之勢，竟前後相反若是。自今以往，其僅存之版圖，是否能永無殘闕，恐尚在不可必得之數。然則讀是書者，其能無顧名思義，憂勤惕勵，而謀所以保茲疆土之策，毋貽前人之羞也！²⁷

《大清一統志》於清代進行三次重修，最後一次斷限在嘉慶二十五年(1815)，道光二十二年(1842)進呈後，礙於國事動盪，直到清朝覆亡，都未能刊布。張氏雖然關心印書館被戰火毀於一旦，但更在意這顯示著國家衰敗的現象。跋文中，張氏陳述讀《大清一統志》的心境轉折。首先是對於康、雍、乾三朝盛世太平的景象，國家版圖遼闊的追往。其次西力東漸，朝廷不能自立自強，致使國土被列強以船堅炮利

²⁴ 同前註，頁 942。

²⁵ 徐中約撰，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下冊，頁 573-574。

²⁶ 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下冊，頁 944。

²⁷ 同前註，頁 896-897。

占領，外國人可以自由進出，其軍隊輕易駐紮在中國的任何一地；對於國不成國，發出讀書人對天下事的憂心。最後張氏拾起對於國族的信念，希冀藉由輿圖學，惕勵讀者關心國家正處於飄零之際，進一步能對抗外侮，復興國土。

由許多的跋文中，時常可以看見張氏在校書時所透露的心情；雖然他不研究《春秋》，也不鑽研輿圖學，卻從現實環境裏，體會經、史之中的學術，而能表達校勘外更深層的見識。簡單說，他將對國家的希望，全部寄託在輯印古書之中，期待傳統學術能帶給國家繁榮的前景。

五、數典不忘

張元濟先生的九世祖張惟赤，在清順治、康熙朝致仕後，便回到浙江海鹽，並且擴建其父原先的書房「大白居」，改名為「涉園」，此後張家後代致力於藏書與刻書；藏書之盛，名聞一時，甚至連鮑廷博(1728-1814)、黃丕烈(1763-1825)都前往借書校勘。然而在嘉慶、道光以後便中落，至咸豐更遭兵燹，書籍散失殆盡。因此張氏在出生前，並未見到涉園藏書之盛，只剩破敗的景象。

在「俯仰盛衰，慨然興嘆」²⁸之餘，張氏措意的古籍中，也注意有無涉園流出的書籍，並且輯印出版《海鹽張氏涉園叢刻》；同時，張氏又一面措意於先師的作品。無論是先祖抑或是先師的作品，張氏都撰有跋文。從跋文中，大致可將張氏的追憶情感分為發揚祖訓，憶人感時來討論。

(一) 發揚祖訓

張元濟先生認為涉園代表歷代祖先的精神，是家訓的具體象徵，卻終遭衰敗的運命。張氏景仰張惟赤維護百姓利益，而對抗朝廷政策的精神，這是他輯印《海鹽張氏涉園叢刻》的主要原因，跋文曰：

清朝入關之始，滿、漢不無歧視，雷霆萬鈞，孰敢抗違？而螺浮公〔案：即張惟赤〕乃有「刑部審鞫錄供，不宜但憑滿官執筆」，及「人民投充滿洲，餘地發當壯丁，不許復園民地」之奏，吾於是益曉然於致君澤民之道。²⁹

²⁸ 同前註，頁 1087。

²⁹ 同前註，頁 1085。

張氏在此點出張惟赤面對清廷嚴格的法令，卻能挺身而出；就身為朝臣而言，對上是匡正國君的錯誤政策，對下則施惠於廣土眾民。張氏表彰先祖的憂國憂民，並以此為刻書的動機，反應出其對於家訓不僅是藏書、刻書而已，更有為民請命的責任。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士人的理想，但儒者即使「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是否能治國、平天下，端看統治者的運用。雖然如此，儒者往往能做好修身、齊家這一層面；張元濟先生歷代先祖保有這樣的德操，對張氏本身而言，動盪之際仍不忘修身為國，有莫大的勉勵作用。在《海鹽張東谷先生遺墨》的跋文曰：

此余六世叔祖東谷公遺墨也。……書中所述，大抵皆家庭瑣事，親戚情話，殊不足以窺見公之生平。然其訓女孫之辭，於事親，則曰「宜奔走代勞，不可退後」；於治家，則曰「宜勤儉習勞，事事留心」；於御下，則曰「宜寬厚，惜衣有衣穿，惜人有人使」。語語真摯，皆布帛菽粟之言，洵足為吾家典範矣。³⁰

張氏對六世叔祖之於晚輩的告誡叮嚀，視為立家精神的典範；所列的警句，無非是為人謙遜，待人和氣，勤儉謹慎，而此正是修身、齊家的基本道德。張氏晚年仿朱用純(1617-1688)的〈治家格言〉撰寫〈新治家格言〉；雖說是仿朱子，但也繼承先祖的遺訓，並且加以發揚：

為人之道，修身為本。……人貴自立，須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獲。修身之要既盡，齊家之事宜詳。……毋信無才是德之謠，女子宜習專業。毋蹈數典忘祖之弊，游學遂變於夷。家有僮傭，并宜善視。……國家有我一分子，民主無任再落伍。……四海皆兄弟，願世界進於大同。³¹

就承繼祖訓的角度來看，張氏除重複提醒修身、持家的重要外，更兼及世代的變遷，融入新的觀念；但無論如何變動，仍是以「修身」為要，再擴及國家，最後希望能達到《禮記·大同》的理想世界。可以說張氏懷念先祖，形式上並不限於刻書、藏書的情景，感情上也不局限在垂淚感嘆而已，而是提升到正君惠民的境界；輯印先祖的書籍，正是要發揚家族「以天下為念」的精神。

³⁰ 同前註，頁 1076-1077。

³¹ 張元濟：〈新治家格言——仿朱柏廬兼補其所未備〉，《張元濟詩文》，頁 224-225。

(二) 憶人感時

張元濟先生在理性與感性的交織中，表現多為理性，但從跋文中可看出，追憶先人感嘆世事多變的話也不少。清末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翁同龢(1830-1904)，是張氏會試那年的主考官，新科進士多視主考官為老師；加上翁同龢與張氏都是主張維新變法，師生情誼更為濃厚；《翁文恭日記》的跋文：

有宋名臣，以文學政事顯者，曰歐陽修，曰司馬光。求之近今，足與媿匹者，其惟吾師公文恭乎。雖然，吾讀《宋史》，未嘗不嘆二公遭際之隆，而悲吾師之獨阨也。……國勢寢弱，士大夫昌言變法，新舊交爭，漸成門戶之見。國步艱難，與二公所處正同。公以一身樁柱其間，而卒不免於得罪以去。其困心衡慮，必有甚於二公者。³²

張氏提到歐陽修(1007-1072)、司馬光(1019-1086)所處正值新、舊黨爭之際，都是處於保守派而於政治不得伸展。讀史鑑今，翁同龢適處於保守派與維新派抗衡的朝政，而且翁氏支持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並為變法撰寫《定國是詔》，最後維新派失利，被罷官回鄉，康有為(1858-1927)甚至譽其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張元濟是當時維新變法的人物之一，對於翁同龢的用心感到同情，認為翁同龢主張變法是為了救國，卻被罷官，張氏心中非常不平，遂「痛世人知公者少，因請以《日記》行世」³³。

念及先師，甚至傷嘆時事之非，張氏對於歲月的流逝，亦深有其感。《張子青畫冊》之跋曰：

回憶五十年前親承杖履，辟聽之詔，銘心不忘。今二公英靈久歸天上，白頭弟子猶活草間。睹茲滄海橫流，正不僅山頹木壞之感已也。³⁴

張子青是張氏參加會試的「受知師」，翁同龢是該場的主考官，兩位老前輩可說是提拔張氏的恩人。張子青工於畫，翁同龢善於書法，都留下不少作品；張元濟先生得到兩位恩師的遺作，激起他對過去師生間互動的緬懷。既是師生關係，同時又在朝政中為國效力，時間如流水，兩位先生早已辭世，唯張氏身為學生尚存於世；夕陽依舊，人事已非的感觸，其心情躍然紙上。

³² 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下冊，頁 1094。

³³ 同前註，頁 1095。

³⁴ 同前註，頁 1125。

從跋文了解到，張元濟先生對先人的懷念常與國事結合，他不像常人追懷僅限於感情的悼念，而是承繼後並發揚；但相同地，張氏生活世代交替，從政治核心退到民間出版者，對過去種種的景象也難掩感時的心情。

六、結 論

由以上討論，歸結出幾點結論：

第一，張元濟先生早期以出版教科書為主，對於近現代教育改革有推波助瀾之功。從廣告詞略窺張氏編輯教科書的理念，既能融合西方理論，又不失中國文化特色，可說是用科學方法來從事教育改革；一方面也強調普及教育，以及培養愛國精神。

第二，輯印古籍是張元濟先生第二階段的工作，是他最為關心的。張氏堅信唯有保存文獻，才能發揚中國文化，不至於亡國滅種，這樣的取徑與鑽研文化研究的學者不同，但用心卻是一致的。在跋文中，他時時強調統治者應該抵禦外侮，安民立國，無不藉由前人的作品來反省現實環境。

第三，張元濟先生有感涉園的書籍散佚，於是致力蒐集涉園當時的藏書；同時張氏也覽見其先師的作品。這些關於其家世及早年活動的人物，張氏在跋文中不斷回憶：緬懷祖先，不是單純停留於感情上，而是更能發揚祖先憂國憂民的精神；對恩師的情感，則是回想過去在朝政中同心的情景，然人事已非，留給張氏「白頭弟子猶活草間」的感慨。

張氏曾說：「余嘗言一國藝事之進退，與其政治之隆汙、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況在書籍，為國民智識之所寄託，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胎，抱殘守缺，責在吾輩。」³⁵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足以反應國勢的興衰，尤其是書籍，更是延續文化的重要命脈；所以觀其一生，主要以編印書籍來發揚對國家的情感³⁶。張元濟先

³⁵ 張元濟：〈寶禮堂宋本書錄序〉，《張元濟詩文》，頁 280。

³⁶ 張氏對於古籍的情感更深，他曾致傅增湘（1872-1949）書信道：「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於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餘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這段語重心長的話，更可以見得清末民初讀書人邊緣化的情形，以及致力於將傳統經世濟民的書籍，再次成為有用之書。見張元濟：《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頁 145。

生承繼了中國文化中讀書人的責任；雖然不能在朝為官，為民請命，但退居到民間的出版事業，依舊心繫國家百姓。他的著作雖然不多，但如果將跋文視為張氏的著作，則其中所透露的正是他的想法。換言之，文獻家在樸學的領域裏，仍有強烈的思想意識。